

王春瑜 / 主编

中

國

【第五卷】

宋

文  
化

范学辉 /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

小

通

史

9

K230.3-49

1

:5

# 中國文化通史

清園

【第五卷】



○ 范学辉/著

○ 王春瑜 主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# 序

王春瑜

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大陆曾掀起一股文化热，报刊上竞相刊登“什么是文化”、“什么是中国文化”的争辩文章，堪称轰轰烈烈。其背景应当说是对十年浩劫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浩劫的拨乱反正。我们这一辈亲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人记忆犹新：在那十年中，多少名胜古迹被人拆毁，多少文化名人惨遭迫害！除了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，一两部样板小说，茫茫中国大地几乎成了文化的废墟和沙漠。问泉哪得“死”如许？为有源头“浊”水来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17年中，由于“左”的思想作祟，在不少领域，文化被严重削弱。以历史学为例，在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思想主导下，中国通史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，文化——包括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以及世风、民俗等，不是以三言两语打发，就是砍得一干二净。十年浩劫，本来就是“左”的思想不断积累，最后恶性膨胀的结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成了“大革文化命”，这段惨痛的历史，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、思考文化。

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论争一样，众口热说，也难免良莠并陈，泥沙俱下。无论是反思还是研究，本来都应当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（包括定义）出发，但有些学者拾西方人的牙慧，引进文化的种种定义，谁也搞不懂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；也有一些学者，从理论到理论，从概念到概念，脱离中国历史实际，一味空谈，恰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茫茫大士”、“渺渺真人”。这些空谈，只能使人茫然不知所措。有位著名历史学家曾经无奈地说：“文化，不说我很清楚；现在越说我越糊涂

了。”此言耐人寻味。学术研究玄之又玄，急功近利的“泡沫文化”又在铺天盖地地向大众涌来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以为编一部简明扼要而又雅俗共赏，尤其是适合于正忙着奔小康的人们阅读的《中国文化小通史》是必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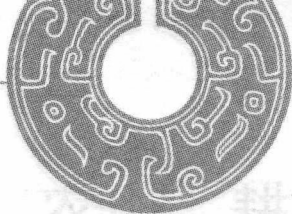
所谓文化，无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，也有学者用“大文化”这一概念将二者都包括在内。在我看来，中国文化史，就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生、发展的历史。物质文化，指的是生产方式、科学技术、商业运营等；精神文化，指的是文学艺术、世风民俗、思想或宗教信仰等。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，精神文化能够促进或阻碍物质文化的发展，二者是有机的整体，互相影响，互相渗透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构思了这套《中国文化小通史》的框架，约请史学界的同道来共襄此举。当然，简明不等于降低学术质量。值得读者庆幸的是，这套丛书的撰稿者，都是名副其实的专家、学者，有几位还是全国知名的断代史权威。凭着我对他们的了解以及他们为我主编的《中国反贪史》、《中国小通史》撰稿时给我留下的温馨回忆，我相信本书的学术质量是上乘的。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的杂文随笔集《铁线草》，《中国文化小通史》的出版，是我们之间的又一次愉快合作。在此过程中，我感受到该社的热心与负责，特在此表示感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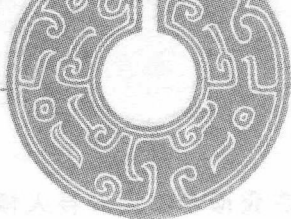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文化的民族，是愚蠢的民族。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遗产记忆的民族，是没有希望的民族。愿将这套《中国文化小通史》，献给那些热爱祖国文化遗产、关心民族命运的读者。

2004年甲申岁末于京华老牛堂

# 目录



<b>第一章 农 耕</b> .....	(1)
一、人口的增长 .....	(1)
二、垦田面积的扩大 .....	(3)
三、农具的革新 .....	(5)
四、农田水利建设 .....	(7)
五、南北粮食作物的交流 .....	(10)
六、精耕细作的江浙农业 .....	(13)
七、棉花和桑麻的种植 .....	(15)
八、果树种植的发展 .....	(18)
九、茶树种植面积的扩大 .....	(23)
<b>第二章 商 业</b> .....	(25)
一、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.....	(25)
二、市场的扩大 .....	(26)
三、钱荒和纸币的流通 .....	(29)
四、专卖制度的强化 .....	(34)
五、对外贸易的兴盛 .....	(35)
<b>第三章 科学技术</b> .....	(38)
一、指南针、火药和活字印刷术 .....	(38)
二、大科学家沈括和他的《梦溪笔谈》 .....	(41)
三、贾宪、秦九韶、杨辉与宋代的数学 .....	(43)
四、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 .....	(45)
五、天文与历法的革新 .....	(45)
六、医药学 .....	(49)
七、建筑科技的进步 .....	(54)



八、手工业技术的革新·····	(58)
<b>第四章 思想</b> ·····	(70)
一、宋学的形成·····	(70)
二、荆公新学、温公学派和蜀学·····	(75)
三、北宋理学五子·····	(81)
四、南宋理学的发展·····	(88)
五、佛教的传播·····	(94)
六、道教的兴盛·····	(97)
<b>第五章 文学艺术</b> ·····	(101)
一、古文运动·····	(101)
二、宋代的诗歌·····	(105)
三、宋词的繁荣·····	(109)
四、史学的进步·····	(115)
五、辉煌的绘画艺术·····	(119)
六、灿烂的宋代书法·····	(127)
<b>第六章 风俗</b> ·····	(132)
一、南北饮食·····	(132)
二、男女服饰·····	(137)
三、居室与家具·····	(142)
四、水陆交通·····	(143)
五、婚姻时尚·····	(146)
六、丧葬礼仪·····	(149)
七、节日庆典·····	(151)
八、教育与科举·····	(156)
九、体育运动·····	(158)
十、娱乐活动·····	(162)

# 第一章 农 耕

## 一、人口的增长

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，农业生产的发展，离不开充足的劳动人手。因而，人口的增长，在古代就不仅是社会经济繁荣的表现，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因此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，在古代历史上就是生产发展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在宋朝以前，中国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，还经常出现负增长。两汉最高人口数为五千多万，唐代开元盛世时人口达到六千多万，人口不过增长了千余万。经过唐末、五代频繁的战乱，人口又有大幅度的减少，直至后周世宗后期，中原王朝的人口总数仅为九十六万户，不足五百万口；即使是加上南方地区的诸割据政权，也不过是二百万户、一千万口左右，仅相当于唐代最高数字的六分之一。

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方有了根本性的改观。北宋开国伊始，宋太祖就颁布了许多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，把各地人口的增减与否，规定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。特别是募兵制度的推行，对人口的增长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古代人口增长比较缓慢，原因很多，其中征兵与徭役征调造成的生活动荡与夫妻长期分居，就是对人口增殖很不利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而在宋代的募兵制度下，由于农

民基本上不再承担兵役，和厢军分担了农民的大部分劳役负担，使得广大农民“老死不识兵革”，夫妇偕老，“保骨肉完聚之乐”，人口的增长遂得到较充分的保障。此后，随着战争的结束，社会经济的恢复，宋代人口就有了持续而迅速的增长。

到宋太宗至道三年（997），短短的 30 多年时间里，当时的户口就达到了 400 多万户，较五代时期的户口数已经增长了一倍。在对辽、夏战争基本结束的宋真宗时期，人口增长更加迅速，在宋真宗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就增长到了 860 多万户，比宋太宗时又翻了一番。宋仁宗嘉祐八年（1063），户数增长到 1200 多万，是宋太宗时的三倍，已经超过了汉朝的最高数字，同唐代的最高水平约略相等。宋神宗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达到 1700 多万户。宋徽宗大观四年（1110），更是达到创纪录的 2000 多万户，是宋初户数的五倍之多。按每户 5 人的通常情况来计算，宋徽宗大观四年的宋代人口约为一亿以上，远远超过了汉、唐，是汉、唐人口的两倍。考虑到北宋国土小于汉、唐的因素，当时的人口密度更是要大大超过汉、唐的水平。

南宋时期，仅保有江南半壁江山，其统治区域比起北宋要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，又遭到了对金的战争的摧残，因而人口总数不如北宋。宋高宗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南宋户数为 1100 万，为宋徽宗大观年间的二分之一强。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增长到 1200 多万户。按每户 5 人计算，南宋人口大约在 6000 多万左右。如果加上同时期在金朝统治下北方的 4000 多万人口，全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在一亿左右，和北宋基本相当。



南宋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不如北宋，但在江南的许多地区，人口较北宋时还是有了幅度不小的增长，以自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）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为例，比较突出的地区就有：江西地区，由150万户增至220多万户；湖南地区，由90多万户增至120多万户；福建地区，由100多万户增至150多万户；成都地区，由80多万户增至110多万户，等等。

## 二、垦田面积的扩大

土地的开垦，是农业发展最主要的基础，在宋代以前的汉、唐时期，垦田亩数最高达到三亿多亩。唐末、五代，由于战争的破坏，许多本来已经开垦的土地重新被抛荒，到北宋局部统一基本完成的宋太祖开宝八年（975），全国垦田亩数下降到了两亿多亩。

为此，宋太祖等宋代的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的政策，规定：农民新开垦的土地不仅归农民所有，而且在三五年内都不收赋税，以后也是按三分之一的优惠税率收税。等等。在这些政策的积极推动下，随着人口的增长、劳动人手的增多，宋代土地开垦的面积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扩大。

宋太宗至道三年（997），北宋的垦田亩数就恢复到了三亿多亩，与汉、唐已经大约持平。宋真宗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就扩大到了五亿多亩，比宋初翻了一番，也超过了汉、唐的最高水平。宋仁宗、宋英宗时期，由于大官僚和豪强地主隐瞒他们占有的大批土地，国家登记的垦田数



略有减少。王安石变法时期，随着农田水利法、方田均税法 and 青苗法等多种改革措施的推行，北宋土地的开垦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，到宋神宗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垦田数就达到了创记录的八亿多亩。这个数字，是汉、唐垦田面积的两倍之多，大致与后来的明代水平相当。

两宋时期，不仅平原地区大多开垦为良田，“无尺寸旷土”，就连在汉、唐时期开垦较少的山地丘陵以及江湖泊地区，也都被广泛的利用起来，出现了许多适宜当地环境的新的土地利用形式。

福建的多山地带，根据当地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客观条件，在宋代就“垦山为田”，开辟了大批的“梯田”，使福建成为当时全国土地垦辟最多的地区之一。梯田的出现，是丘陵山地利用的划时代进步，很快就迅速地向全国范围推广。

在江、浙的低洼水涝地区，则进行围水造田、围湖造田，开垦了旱涝保收的“圩田”。圩田开始于唐末五代，至宋代得到大规模的发展。宋代的圩田，大多规模很大，方圆可达数十里至数百里，就像一个大城市一样。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参与修建的芜湖县的万春圩，圩中土地面积就高达近十三万亩。圩田除了筑圩围水以外，还配套设有河渠、门闸等水利设施，在干旱时能够开闸引江水进行灌溉，使圩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，最适宜于水稻的种植。南宋时，围湖造田、兴建圩田进入了高潮，大批的圩田在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地区星罗棋布，当时许多地方圩田面积达到了水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。圩田还沿长江西上，向湖北等长江中游湖泊地区推广，在当地称

“垸田”。不过，过度的围湖造田、围水造田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湖泊退化、洪涝水害加剧的负作用，这在宋代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在江、浙等地的江湖水面上，宋代还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土地利用形式——架田。架田也叫葑田，是一种浮在水面上的田丘，形状与木筏相类似，能够自由地移动，十分适宜于种植水稻和蔬菜。架田在北宋时开始出现，南宋时已经遍及江南水乡。

江浙、福建等地的江河边沿地区，出现了“沙田”，也叫“沙洲田”，是把沿江地带冲积而成的沙洲，改造为农田。

福建等沿海地区出现了“海田”，即与海争地，在海滨修建堤坝，拦截海潮水，然后用淡水冲刷，把滩涂改造为农田。浙江沿海也有大量的“海田”，称“涂田”。

北方黄河中下游等沿河地区，出现了“淤田”，就是利用决放河流的办法，使河流内沉积的淤泥流入农田，把原本贫瘠的土地改造成良田。在王安石变法时期，北宋设立了总领淤田司，专门负责在黄河、汴河等沿河地带推广淤田。

### 三、农具的革新

两宋是古代农具发展的重要时期，尤其是犁地工具、水田稻作工具和灌溉工具等有了十分突出的革新。

犁地工具方面，唐代出现的轻便灵巧、便于深耕和精耕细作的曲辕犁，在宋代就被普遍地运用于农业生产，并在江浙地区得到了较大的改进，如广泛地安装铁制犁铧，

进一步细分为尖头和圆头两种，以适应不同的土壤状况，从而更加适于南方水田的耕作。

南宋时发明了一种新农具“开荒犁刀”，犁刀形似短镰，锋利耐用，安装在犁上，特别适于开垦杂草丛生的低洼荒地，对两宋时期江浙地区农田种植面积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宋代还有一种以人力代替牲畜的“踏犁”，效率可以达到牛拉犁的一半，适于缺乏耕牛的地区使用。北宋初年，由政府出面对“踏犁”进行了革新和推广，在河北等北方地区得到普遍使用。南宋时期，踏犁在南方少牛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地推广和改进，一直得到人们的重视。

灌溉工具方面，宋代普遍运用龙骨“水车”。不仅功效大，而且可以把低处的水提到高处，也可以用来排涝。根据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《水车赋》及“水声终夜救田车”等诗句的描写，可以知道当时江南水乡已广泛地使用水车，用以满足水稻种植的需要。“水车”大部分用人力脚踏，到了北宋中期，福建地区又出现了“牛转翻车”，即用牲畜转动水车。利用水流力量转水的水力“筒车”，是唐代后期发明的一种新的灌溉工具，由于它可以昼夜不停地浇灌田地，而不用耗费人力，因而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使用。

宋代水田稻作工具的发展最为突出，创新很多，主要有：

秧马。水稻插秧农具，宋神宗时期由湖北武昌一带的农民发明。秧马的形状像一条小船，两头高，中间凹，底部用光滑的榆木或枣木制作，以便于在水田上滑行；背部

则用很轻的楸木、桐木制作，以免压伤秧苗。骑着这种秧马插秧，可以大大减轻劳动的强度，还能提高插秧的速度，因而在当时很快地被推广到了江浙、广东等地区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为了推广应用“秧马”，还专门写了一首《秧马歌》。

抄。平整水田的工具，最早见于南宋的《耕织图》。抄的出现，标志着南方水田整地技术趋于成熟。

耘爪。稻田除草工具，南宋时期开始使用，元代时普遍推广。即用竹管做成手掌形状，套在手指上，以避免除草时手指直接与田土接触，既可减少手指损伤，也可更好地整理秧苗。

耘荡。稻田中耕工具，南宋时期由江浙一带农民创制，元代普遍使用，作用类似于北方的耙耧，可大大减轻农民耘禾的劳动强度，又能提高工效。

除此之外，像碎土疏土用的铁耙，安装在耨车车脚上的铁铧，除草用的弯锄等农具，也都在宋代得到了普及。镢头、镰刀、铡刀等常用的农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，更加轻巧耐用。

宋代的农具，随着冶铁和炼钢技术的发展，许多已经属于熟铁钢刃农具。相比于以往的生铁农具，熟铁钢刃农具更加坚韧耐用，更能承担高强度的农活，它的普遍使用是古代农业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。

## 四、农田水利建设

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，北宋从建国开始，就十分重视农

田水利的兴修。王安石变法期间，在熙宁二年（1069）就颁布了《农田水利法》，运用国家立法的手段，积极推动各地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。从熙宁三年（1070）到熙宁九年（1076），掀起了一个持续的兴建水利的高潮，全国共计兴修水利工程 10793 处，可灌溉农田高达 3611 万亩，这是中国古代水利兴修史上的一个高峰。

北方地区农田水利的兴修，以整治黄河、化水害为水利为中心。自秦汉以后，随着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加剧，大量泥沙流入黄河，导致黄河下游的河床泥沙淤积，不断地发生决口和改道，仅在宋仁宗的时候，黄河就连续两次大规模的决口，造成了严重的水患。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，堵塞了黄河的决口，使淹没的土地得以恢复，并加固了沿河堤坝。为了根治黄河水患，在王安石的支持下，北宋在熙宁六年（1073）成立了“疏浚黄河司”，使用当时新发明的工具“铁爪龙”和“浚川耙”，尝试着清除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。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，“铁爪龙”和“浚川耙”未能收到多少实际作用，但思路是正确的，也是黄河水患治理史上的一个创举。

除此之外，宋代北方地区比较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有以下两项：

一是从北宋初年以来，就利用当地湖泊众多的条件，在今天河北雄县、任丘、霸县等地大规模地兴修堤堰 600 多处，设置斗门进行调节，引湖水灌溉、种植水稻，把宋辽边境地区改造成为水田，从而既增加了粮食收成，又可阻拦辽国骑兵的南下，在宋代一直被视为重要的战略

工程。

二是宋徽宗大观二年（1036），在陕西关中地区兴建了工程浩大的丰利渠，开凿石渠引泾水，能够灌溉关中7个县多达三百五十多万亩的农田，远远超过了汉、唐时期的历史最高水平。

宋代南方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比北方还要发达，如宋仁宗天圣六年（1028），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建议和主持修筑了北起今天江苏连云港，南至启东，全长约一百五十多里、工程历时约四年的捍海堤坝，使堤内千万顷盐碱荒滩成为良田，后人为了表彰范仲淹兴修水利的功绩而将其命名为“范公堤”。宋神宗熙宁八年（1075），在李宏的支持下，福建莆田成功地修建了木兰陂，既可蓄水，又能防范海潮，使得上万顷农田得以灌溉，是福建最有名、效益最好的农田水利工程。四川地区著名的都江堰，在宋代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，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宋代南方最受重视、成效也最大的农田水利工程，是对太湖流域的综合水利治理。太湖流域降水丰富、地势低洼，水利建设是以排涝防洪为重点。当地的“圩田”、“湖田”既是农田，也是调节水量的水利工程。更重要的办法，是开挖塘浦，疏通河道，疏导排水。五代吴越的时候，吴越组建了七八千人的“营田军”，也叫“开江营”或“潦浅军”，专门负责太湖水利的整治和维护，使得太湖流域初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塘浦圩田系统水利工程。宋代继承了吴越的成果，从北宋中期开始，进一步全面兴修太湖水利的系统。南宋立国江南，兴修太湖水利始终被作为立国的根本，得到空前的重视。据统计，北宋时对太湖

流域的水利建设，共计有 86 次之多，南宋更是高达 185 次。经过宋代长期的综合治理，太湖形成了水网密布、堤岸高厚、塘浦深阔、河道通畅的水利工程系统，收到了排涝、行洪和通运兼顾的良好效果，为太湖流域成为宋代最发达的农业生产中心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## 五、南北粮食作物的交流

宋代种植的粮食作物种类很多，主要有水稻、小麦、小米、大豆、荞麦等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水稻和小麦。以水稻北上和小麦南下为主要标志的南北粮食作物互相交流，以及由此形成的南宋时期在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制，就是宋代粮食种植所取得的主要成就，也是古代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进步。

南北粮食作物交流和稻麦两熟在宋代得以实现，与当时粮食种植方面两个大的突破是分不开的。

### 1. 占城稻等优秀品种的引进

占城稻，原产于今天越南的南部地区，五代时最早传入我国的福建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）推广到了江浙和淮南地区，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）宋真宗又亲自在开封皇宫内试种，成功后向北方地区推广。

相比于其他水稻品种，占城稻的突出优点是：耐寒、耐旱、早熟，而且适应性强，对土地肥力的要求低，因而占城稻不但适宜在南方较为干旱的山地和丘陵地种植，也适宜在寒冷和干旱的北方种植。占城稻的引进使宋代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近一倍，极大地促进了水稻的生产。占



城稻的传播过程中，还分化出许多适合各地环境特点的变异类型，为水稻品种布局的合理化和多熟种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，因此，南宋以后，水稻就成了大众的主要食粮。

## 2. 水稻育秧和移栽技术的普遍运用

水稻育秧和移栽技术出现在唐代中期，至宋代得到普遍的运用。这两项技术解决了水稻和小麦的用地之争，因为小麦的生长期通常是八月至下一年的五月，而使用直播种植方式的水稻，通常的生长期是每年的三四月至九月，两者互相冲突，难以在水稻收获后复种小麦。宋代普遍改用育秧和移栽技术以后，水稻在大田中的生长期大大缩短，通常为五月插秧八月即可收获，从而使水稻和小麦在时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的空白：小麦的播种恰恰在水稻收获之后，而小麦收获后又不误水稻的插秧，水稻和小麦的复种两熟才成为可能。

宋代政府的相关政策，也推动了南北粮食作物的交流。宋太宗时，曾鼓励广大南方地区种植小麦、小米、大豆等北方的粮食作物，由官府免费提供种子，还免除南方农民种植小麦等的租税。宋神宗时，还由官府出面招募南方农民到北方种植水稻。到了南宋，宋孝宗多次下令地方官鼓励和督促农民广种小麦。

随着宋代南北作物的相互交流，水稻在北方的种植面积不断地扩大，今天的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区的水稻种植在宋代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。河南开封及其邻近的汴河沿岸，稻田分布很广，汝州（今河南临汝）设有北宋官营的“稻田务”，专门负责种植水稻；共城（今河南辉县）的水稻以品质见长，在北宋一直是供应宫廷的贡